

戰爭與台灣的高等教育，1945-1990*

黃金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研究台灣的高等教育演變，有兩個突兀的階段值得做深入探討。一個是 1950 年代前後，高等教育在台灣急速增加；一個是 1990 年代前後，因應教育改革運動而出現的大學林立現象。前後兩個階段各有其特定發生脈絡，其對個人、大學和社會造成的影響，正隨時間拉長而浮現。這種綿延不絕的走向，和其引致的對高等教育的不滿，必須放在 1945 年後國民黨政權經歷的內戰與冷戰來觀看才不會有漏失。政權生存和經濟發展雖然是明顯可見的因素，但這兩個因素還不足以解釋 1945 年後的台灣高等教育，為何會有戲劇性與特定性的演變。這個變化必須和戰爭扣連起來才有清楚答案。將戰爭帶回來，不是要否定前兩者的作用力，而是要在更大的框架下，察看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究竟受到哪些力量的交錯牽制，而這種交錯發展又和戰爭的發生與進行脫離不了關係。戰爭的生產性、目的性和限制性，如何反映在大學系統的建立與發展上？其對大學的性格塑造和對教育正義的滲透也需要受到正視。過去只以國民黨政權的威權政治，和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等，來討論台灣的高等教育，這些論斷容或豐富，其立論卻是將戰爭隱形化或只是當作背景因素，一筆帶過。這個簡化和不足正是本文想要澄清、補足之處。

關鍵詞：內戰、冷戰、高等教育、大學理念

台灣社會學第 34 期（2017 年 12 月），頁 123-167。DOI: 10.6676/TS.201712_34.0005

* 本文初稿發表於「戰爭與台灣社會」學術研討會。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5 年 8 月 15-16 日。

War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1945-1990

Jinlin Hw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90s. Differing from the prevalent arguments that generally identify economic needs and regime survival a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growth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article brings the Civil War and Cold War that Taiwan was encountering back into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laborates how and why the two wars shaped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More than just nursing specific areas of study, to mobilize society for war, the two wars also confined the character of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justice of education in a fundamental way. Taking a macro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situating war as a hidden factor or a background component, I highlight the impacts of war on education.

Keywords: Civil War, Cold War, higher education, idea of university

一、連鎖之變

研究台灣的高等教育演變，有兩個突兀的階段值得做深入探討。一個是 1950 年代前後，高等教育在台灣急速增加；一個是 1990 年代前後，因應教育改革運動而出現的大學林立現象。前後兩個階段各有其特定發生脈絡，其對個人、大學和社會造成的影響，正隨時間拉長而漸次浮現。以時間的差距而言，前者經歷的歷程和產生的結果，自然較後者更有被評價討論的條件，畢竟，大學林立造成的後果還需要更多時間來證明大學和社會為此付出多少代價。二十年的時間，其實還不足以全盤暴露這場由民間發動，政府選擇性接手的改革，對大學造成的實質改變。雖然無所不在的競爭已經成為常態，但要評定其利害，在時間上還有不足。當然，這種謹慎並不會妨礙我們用因果性的角度來分析和評價這兩場變化，探究它們的發生緣起與涉及的利害計較，從而形成特定的觀察和判斷。本文的寫作就是試圖在這個路徑上，對台灣的高等教育，和形成這個教育格局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軍事脈絡，進行梳理與分析。為了論理上的清晰需要，1990 年前後的演變，我將留待另文寫作，本文將只就內戰和冷戰格局下的台灣高等教育，進行專文討論。關乎高等教育的其他面向評論，則留待未來再陸續完成。

在論斷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時，「國家的需要」一直是關鍵的爭論所在。從 1950 年代初期開始，配合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需要，培育適當和足夠的專業與技術人才便成為高等教育的職責所在。國家如是宣稱，教育主管機關和大學體系也如是自我期許。這個以國為主要的教育立場並不特別。它幾乎是所有的執政者和國家主義者都會表露的立場，但也從這種立論中，個人與教育被吸納成為國家的工具，難以賦予自主性。有趣的是，在討論發展型國家的成功案例時，台灣在人力資源上的培植，以及以此圓成資本積累體制的積極事實，也成為正當化國家統合和干預高等教育的理論依據。以國家做為出發點，政

府部門的主事者和發展型國家的理論者在此取得看法一致。毫無疑問，他們都同意，經濟發展必須以人力資源的開發做為條件，否則無以形成資本積累和國家競爭力，更難達到後進國家發展的目標。

這種配合政治和經濟發展需要的教育規劃，也成為 1990 年代的教育改革者在訴求人本教育時，攻擊的主要目標。對後者而言，教育不應該只以國家的需求做為考量，在制度上限制和裁奪人民的選擇權。將教育變成人力規劃的過程，將窄化教育的方向和人可以透過教育成就自我的空間。1994 年的「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就是試圖以民間的動能，將以國家為主的「集權—管制」作為，替換為「自主—監督」的教育方向。¹ 暫不論這個訴求的具體內容和效果如何，以政權利益和經濟發展做為目的的教育規劃，顯然不再被視為當然。如此的反省除了和教育體系內充滿著管理主義、粗廉主義與升學主義的遺害有關外，也和民主化的進程和社會力的釋放有關。在威權體制遭受質疑和挑戰時，以威權體制為保護者和擁護者的教育體系自然難逃被檢討的命運。對曾經生活並成長於威權政體下的世代而言，這些批判與訴求並非無的放矢。沒有實際的壓抑和管束，乃至以人為工具的積累表現，「鬆綁」（或者說，解除管制）不會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就成為一個時代符號。

這種綿延不絕的走向，其引致的不滿，必須放在 1945 年後國民黨政權經歷的內戰與冷戰來觀看，才不會有漏失。政權生存和經濟發展雖然是明顯可見的因素，但這兩個因素還不足以解釋 1945 年後的台灣高等教育，為何會有戲劇性與特定性的演變。這個變化必須和戰爭扣連起來，才会有清楚答案。畢竟，國共之間的內戰，和台灣被納入冷戰體系，成為美蘇對抗上美國可以靈活運用的地緣政治棋子，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和教育等都產生過關鍵影響。戰爭涉及的不只是軍事武力的對抗，也不只是死亡和飢荒的製造，戰爭具有的生產性，和其對國家社會可能產生的方向性與目的性限制，也應該

1 有關於「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的主要訴求，請見黃武雄(1997)的相關篇章說明。

受到重視。只以政權生存和經濟發展來討論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可能會陷入孤立化看問題，或者過度放大前兩者的權重危險。將戰爭帶回來，不是要否定前兩者的作用力，而是要在更大的框架下，察看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究竟受到哪些力量的交錯牽制，而這種交錯發展又和戰爭的發生與進行脫離不了關係。戰爭的生產性、方向性、目的性和限制性，如何反映在大學系統的建立與發展上？其對大學的性格塑造，和對教育正義的滲透，也需要受到正視。過去只以國民黨政權的威權政治，和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等，來討論台灣的高等教育，這些論斷容或豐富，其立論卻是將戰爭隱形化或只是當作背景因素，一筆帶過。這個簡化和不足正是本文想要澄清、補足之處。

以 1945 年做為分界，一個有趣的對比是，日治時期的台灣只有台北帝國大學（創校於 1928 年）能列名為高等教育。其他的農林和工業專門學校，以及師範學校等都還在門牆之外。雖然就相對的位置而言，後三者在那時已屬進階層級，但還難稱得上高等教育。這個孤寡發展反映著殖民政府的統治政略，以及殖民宗主國對殖民屬國的知識壟斷。以人口比例而言，超過五百萬的人口卻只設立一所大學，（而且宗主國人民還有優先入學的權利，）這個稀薄數字和差別待遇清楚顯示，殖民政府只以榨取殖民地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做為施政方針，高等教育不在其財政支出和政治治理的範圍內。

然而，隨著政權的更迭，1946 年後，台灣開始出現第一波的大學設立浪潮。最明顯的是，除了將台北帝國大學改名為台灣大學外，原來的農林專門學校、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也在 1946 年升格為省立農學院和工學院。1950 年後，隨著內戰結果的確立與國民黨政權的遷移台灣，不到十五年的時間，以新設或復校的方式，台灣陸續成立了 6 所公立大學和學院，以及 12 所的私立大學和獨立學院。加上原有的三所改名與改制大學，總校數快速增加為 21 所的大學和獨立學院。就絕對數字而言，其增加量十分明顯。能透過考試和其他優惠措施進入大學就讀的人口，也因之大幅增加。當然，這裡頭不乏公平性與階級

複製的爭議存在，但相較於日治時期，高等教育的大門已經擴大不少。

除了數量的增加外，這個時期的高等教育擴張還有兩個值得留意的變化。一個是軍警官校的大學化走向，一個是私立大學中教會大學的比例問題。這兩個邊緣性變化不約而同地透露高等教育在當時的特定演變。當然，它們的變化也刻示政權生存與教育發展的親密關係。以陸軍、海軍和空軍官校的四年制大學教育來說，其制度化的時間分別是 1954 年（陸軍官校與海軍官校）與 1960 年（空軍官校）；中央警官學校則是在 1957 年設立四年制大學部，頒發學士學位文憑。縱觀當時的高等教育環境，陸軍官校和海軍官校幾乎比絕大多數的大學和獨立學院，更早提供四年制大學教育給在學學生。² 考量軍警官學校的畢業生絕大多數從事國防和治安工作，其人力品質攸關政權生存與治安發展，這個優先規劃並非無理。同樣的優先性也顯現在政治大學的復校上。做為中央政治學校（前身為中央黨務學校）和中央幹部學校的合併產物，政治大學一直是國民黨政權的人力培育搖籃。要在台灣重建反攻復國的條件，軍警人力和政治領導人才缺一不可。以大學教育提升治國的人力品質，自有其必要。政治大學做為國民黨政權在台復校的第一所正規大學，並非偶然。³ 然而，這些刻意的動作也說明，高等教育在台灣的崛起與發展，有其政治考量。這個成分在後續年代有愈發分明的表現，也深深影響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

雖然不列名為正規大學，軍警官校竟然能排除萬難，特別是政府財政的困難，比傳統大學更早提供四年制大學教育，這個作為實在只能以非常態視之。同樣不甚正常的是教會大學的高比例設立。從 1954

2 除了 1946 年改制的三所高等院校外，1954 年台灣開始進行復校和新設院校的動作。政治大學復校於 1954 年，早於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等學校，私立大學中，則有東吳大學的復校和高雄醫學院的創校。相對於多數的國立和私立大學，軍警官校確實更早提供四年制大學教育給受教者。

3 一個有趣的一致是，政治大學同時也是冷戰初期美國政府和民間基金會刻意要拉近距離的大學。做為政府高級官員的培養場所，美國很清楚它的利益必須透過台灣的菁英來落實，因此，包括外交、大眾傳播和 MBA 計畫的訓練等，美國都曾透過不同管道給予合作支持。

年東吳大學復校開始，到 1960 年輔仁大學的復校為止，六年之間相繼成立 5 所私立教會大學和獨立學院。⁴ 考量同時期的私立院校不過 12 所，5 所的比例自然醒目。更特別的是，1990 年以前，這些教會大學都是唯一以宗教團體名義設立的大學，佛教和道教等團體皆未獲得類似特許。1990 年成立的華梵工學院（1997 年改制為華梵大學），是解嚴後成立的第一所佛教大學。相較於東吳大學的復校，整整晚了四十六年。數量的顯眼和時間的落差，都值得做評估與考察。我們要如何解釋這類非常態的發展？以政府的「德政」視之，顯然過於簡單，也偏離事實。畢竟，在戰爭臨門的 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面對的是人民解放軍的武力攻台宣示，和自己必須做反攻大陸的準備。在「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戰爭氛圍下，高等教育的發展勢難逃脫戰爭準備的糾葛。⁵ 軍警官校的大學化和教會大學的相繼設立，都和這個局勢的形成有關。

要清楚解釋 1945 年後的第一波高等教育發展，戰爭是不能缺席的因子。同樣不能遺漏的是，取得政權後的中國共產黨對高等教育的改造，以及關閉教會大學導致的遷移浪潮，對台灣高等教育的催生作用。究其實，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經歷了一個從非預期到預期的過程。在 1947 年 3 月胡宗南進軍陝北，收復延安時，國府從未料想過剿共事業會變成傾覆政權的陷阱。隨著全面進攻路線的難以為繼，和共產黨在第一條戰線與第二條戰線上的經營成功，國府的敗象也漸次顯露。國府無力解決戰爭引致的經濟破敗和民心向背，也加速這個局面塑造。1948 年秋冬時分進行三大決戰，即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已成爲力挽狂瀾之役。自此之後，長江以北成爲共產黨統治的地域。國府十分了然，既有的兵力已無法阻擋解放軍南下，江山變色只是時間問題。因爲相較於開戰初期，國府的兵力只

4 除了東吳大學和輔仁大學外，其餘的分別為東海大學（1955），中原理工學院（1955），靜宜女子英語專科學校（1956，1963 年改制為靜宜女子文理學院）。

5 「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首次出現在 1950 年 5 月 17 日的《中央日報》上，其時間為國府撤出舟山群島與海南島的國軍部隊，蔣介石爲此做出告全國同胞書。

剩下 200 萬人，共產黨的兵力則增加至 350 萬人以上。局面的逆轉最後以國府政權遷移台灣，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布新中國的誕生做收尾。爲了重啓「回到大陸」的條件，國府將 1948 年 3 月制訂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直接實施在台灣，並進行軍事戒嚴，以臥薪嘗膽的姿態準備復國大業。這是台灣高等教育初起時刻面對的場景。軍警官校的大學化動作，與「回到大陸」的政治和軍事準備有直接關係。

內戰的結果同時也影響後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權建構後，共產黨人勢必要面對意識型態領域改造的工作，以及高等教育的改革功課。與所有的民族國家類似，1950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是以國家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做爲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標。建設新中國的任務除了表現在初期的課程改革外，也清楚影響 1952 年後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作業。透過這個過程，不但完成高等院校的拆併工作，也讓所有私立大學公立化。一個和本文更有關連的是，教會大學在革命後的接收與關閉過程。就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目標而言，宗教信仰和革命事業之間必然存在內在矛盾。人的解放也包含將人從宗教的宰制中解放出來，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無知和迷信的總代表。⁶ 這個命題始終跟隨著共產主義革命而聞名於世。就此而言，對宗教信仰和教會事務進行鬥爭是遲早的事。即便沒有反帝的政治風潮，教會和教會支助的高等教育也始終是革命道路上的石頭。

不過，這個潛在衝突卻在 1950 年 6 月後提早引爆。這個未預期的變化和朝鮮戰爭的爆發直接有關。對共產黨人而言，朝鮮戰爭不但打斷共產黨人預備解放台灣的計畫，也讓中國和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藉著戰爭動員的機會，共產黨加速其征服社會的腳步。除了透過抗美援朝總會組織和動員群眾團體，進行各種支援前線的革命競賽外，共產黨人也透過愛國公約的簽訂、控訴會的召開，和安排志願軍代表團歸國進行現身說法的動作等，塑造抗美援朝的正當性與必要

6 見 Karl Marx (1964: 44) 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提及的宗教評論。

性（黃金麟 2014）。在強力的論述操作和情感政治舞弄下，一股仇美、反美和恨美的氣氛也出現在中國的地平線上。不獨於此，在愛國主義的包裝下，對共產黨的效忠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與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主動作爲略有不同的是，這個大氣候的形成並不在共產黨人的預計範圍內，但卻產生絕對的收服人心效果。在「前方打美帝，後方挖美根」的動員操作下，反美和仇美成爲人民唯一的選項。聲稱朝鮮戰爭提供共產黨人一個絕佳的時機，以政治動員方式清算美國的在華影響力，並非誇大之詞。

以高等教育經歷的演變來說，隨著志願軍入朝作戰，並取得初期的勝利，肅清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動作，也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正式登場。按人民政府政務院的統計，在「解放」前後，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和宗教團體，約佔當時全中國同類機關團體中的一半左右。以學校來說，「在中國的二十所教會高等學校中間，受美國津貼的即佔十七所之多；三百餘所教會中等學校中間受美國津貼的約近二百所，幾佔三分之二；小學方面受美國津貼的約一千五百所左右，約佔全部教會小學的四分之一」。其他如醫院、社會救濟、出版事業和宗教團體的津貼等，美國也都佔重要比例（郭沫若 1954）。⁷除了關閉和接收這些外國勢力的活動管道外，共產黨也要求教會必須進行教務重整，以自立、自養、自傳做爲今後的傳教原則。在人民政府的號召下，中國基督教的各教會也發表聯合宣言，宣布自此要「最後地徹底地永遠地全部地割斷與美國差會及其他差會的一切關係」（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代表 1954）。也從此開始，原有的教會大學不是關門，就是在台灣尋求復校，或另創立新的學校，繼承香火。1950年後的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無疑受惠於這個革命進程的制訂，與抗美援朝帶來的未預期效果。

對國民黨政府而言，這些教育基地的遷移不啻爲「上天賜予的禮

7 見郭沫若（1954）。此文係 1950 年 12 月郭沫若以副總理身分在政務院做的報告，其內容經政務會議通過，此時志願軍已入朝作戰兩個多月。

物」。除了不需要政府支付創設費用，就能增加高等教育的數目與就學人口外，教會大學的設立也提供國府繼續與歐美國家進行教育合作的機會。對剛經歷戰敗又遷移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而言，這是友善的舉動。畢竟，它是政治上認同國府，教育上繼續與國府打交道的表現。對無法在中國繼續傳教，設立教育事業的歐美教會而言，轉進台灣不只能延續既有的香火，也能配合美國政府的東亞戰略佈署，維持基督教在亞洲的發展。對國府、對教會和對美國政府而言，這都是有利無害的延續。以東海大學的創立來說，它是共產黨接收和關閉大陸的教會大學後，總會在紐約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積極在台灣創辦的教會大學。做為 13 所教會大學的精神繼承，它獲得「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的全部支持。⁸ 從提案研議設立東海大學到破土建校，聯合董事會都扮演積極角色。1953 年 11 月，東海大學的破土典禮是由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親赴台中主持，這個規格在當時實屬罕見。對身處冷戰行列，又深受內戰牽扯的國民黨政府而言，能在宗教和教育事業上與歐美國家維持同一戰線，這是政治正確的選擇。畢竟，維持全面的合作以對抗共產黨政權的武力威嚇，在當時完全符合國民黨政權的生存需要。

二、冷戰的出路

很顯然地，沒有內戰和撤退，共產黨的反帝行動與 1952 年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台灣的大學系統不會在 1950 年代快速擴張，並形成優先性的配置作業。這個另起爐灶的發展有其歷史脈絡。聲稱戰爭是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孕母」，並非突兀之論。因為內戰和冷戰一樣，都在根底之處決定著台灣高等教育的初期崛起和演變。甚至，高等教育的理念、路線與性格生成，也深受戰爭的牽制。從戰時體制的

8 這 13 所教會大學分別是：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東吳大學、之江大學、華中大學、華西協和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大學和嶺南大學。

營造到冷戰體系的滲透台灣社會，高等教育都身列其中，並留下深刻印記。在戰時體制的塑造部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施行於台灣，「不但讓台灣長期成爲軍事管制的地區，在軍事戒嚴之外，政府的組織、經濟的活動和文化的踐行都受到戰爭有形或無形的牽制」。「除了維持龐大的軍隊和武備以維持內戰的能力外，戰爭也成爲政治和社會治理的發動條件，讓威權統治獲得名義和實質的支持」（黃金麟 2009: 24）。從 1949 年 5 月開始，軍事戒嚴就成爲台灣社會和教育體系必須面對的嚴肅界線，憲法賦予人民的各項公民權在戒嚴令面前止步。以高等教育體系來說，除了有黨化教育和軍事訓練的安排外，高等教育最需要的思想、言論、講學和出版自由悉數遭受凍結。在軍警機關可以恣意界定、審查和予奪人民的自由下，以人爲行動者構成的高等教育自然也沒有自由表現的條件。

當然，就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戰時體制只是塑造其路徑的部分條件，它不是所有問題和答案的來源。但高等教育體現的中央集權問題，卻因爲戰時體制的存在而更難掙脫。對國民黨政府而言，戰時體制宛如一個護身符，使其能夠以戰爭之名，繼續壟斷政權與治權，並將高等教育納入政治與軍事管制的範圍。畢竟，從國民黨在大陸掌握政權以來，以訓政之名進行國民革命就成爲其自認使命。爲了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也爲了排除其他政黨對青年的可能領導，從 1928 年開始，國民黨就以「訓政綱領」合理化一黨專政的作爲。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教育權也沾染濃厚的黨治色彩。1929 年，國民黨透過《大學組織法》的制訂，將公私立大學納入監管範圍。1934 年，則是透過修法的手段，取消從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以來，中國大學的教授治校制度。1938 年，因應抗日戰爭的爆發，國府又發佈「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明訂黨義（三民主義）爲必修科目，之後，更強烈要求大學院級主管必須具備黨員身分。從軍訓的實施、經費的分配、黨義的教導到人事制度的設定，大學都成爲國家刻意植力的對象。這個演變說明，戰時體制只是在既有的中央集權體制上，延續國民黨政府對大學的領導。它沒有另闢路徑，也沒有無中生有地，形構

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

做為內戰的衍生物，戰時體制不僅僅和國共的對峙有關，也和冷戰體系的營造有關。雖然動員戡亂體制的出現主要是以共產黨做為對手，希望以台灣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資本來營造反攻大陸的條件，但若沒有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在冷戰過程中的奧援，動員戡亂的體制可能早已消逝無蹤。這個假定和共產黨的意欲軍事解放台灣自然相關，也和台灣人民是否會長期容忍國民黨的軍事統治有關。1950年，共產黨的領導人確實曾經意圖在隔年春天以武力解放台灣，人民解放軍也為此做了準備。至於人民的順從和反抗，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已然埋下國民黨為外來政權的質疑，是否能以高壓方式繼續維持政權的穩定，也還有變數。但這兩個可能終結動員戡亂體制的因素，都沒有變成真實。關鍵的轉折是朝鮮戰爭（韓戰）的發生。因為1950年1月，美國便宣布其安全線不包括台灣和朝鮮。對國府和對共產黨政權而言，這都意味美國不會出兵保護台灣。對腳步尚未立穩的國民黨政權來說，這等於在政治和軍事上宣判國府的死刑，因為自此之後，國府必須單獨面對解放軍的渡海作戰，能否安然渡過第一擊，猶在未定之天。然而，這個絕境卻因為1950年6月北朝鮮的出兵南進，威脅美國在日本的防線，而驟然改變。對台灣而言，最直接的變化就是美國決定派出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防止解放軍藉機渡海攻台。很顯然，美國的安全防線已經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而出現戲劇性改變。這個動作讓國府的動員戡亂體制獲得相對保證。

為了在地緣上防堵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擴張，美國基於自身的利益也開始強化其對國府的支持。曾經做為日本帝國南進時的「不沈的航空母艦」，此刻又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不沈戰艦。這個角色的扮演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也符合國府尋求生存和國際認可的利益。在互有需求，而台灣又不能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情況下，台灣和美國遂在1954年12月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⁹ 此約雖

9 國府原本希望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以取得安全保障，但英國、法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皆表示反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於焉產生，成為中美雙方單獨簽訂的條

然給予台灣軍事和安全保證，但也縮小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為台灣和澎湖諸島。除了將軍事同盟侷限在自衛範圍外，這個條約也限定，台灣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需獲得美國的同意。儘管國府仍然宣稱擁有大陸的主權，這個條約形同否定國府可以實施治權於大陸。為了避免與人民解放軍發生正面交戰，包括金門、馬祖和其他仍在國軍控制的大陸沿海島嶼（如一江山、大陳島等），皆不列入共同防禦的領土範圍。對國府來說，這是一個不滿意，但又不能不接受的妥協。

受惠於朝鮮戰爭的爆發，台灣不但再度成為美國的盟國，獲得軍事裝備與軍事顧問的援助，一個更可觀，同時影響深遠的是經濟領域中的美援支助。從 1951 年到 1965 年，台灣獲得的美援共計 14.8 億美元（不包括軍事武器的 42.2 億美元）。這些透過直接贈與、貸款或技術合作，以及剩餘農糧產品的贈與進行的經濟援助，為 1950 年代的台灣提供對抗通貨膨脹和外匯短缺的條件。除了公營事業（主要為電力、工礦、運輸和水庫興建）獲得貸款支助外，一般的民營產業，如農林漁業、工礦業、中小型工業和教育事業等，也獲得不等比例的經濟資助。¹⁰ 就其歷史結果來說，美援確實是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重要條件。它在資本和技術的層面提供台灣工業化的條件，而透過最惠國的待遇，台灣可以將剝奪農業剩餘培植工業生產的結果，銷售到美國。沒有最惠國的待遇，台灣要變成出口導向的國家，這條路不會如此順遂。以原始積累的概念來說，「以農養工」的積累體制其實是透過美援的挹注，才發動起來的。沒有美援的加持和最惠國待遇的提供，台灣的技術官僚能不能用十五年的時間完成相同的轉換跑道工作，這個問題不無疑義。當然，提出這個問題不是要否定當時的技術官僚的貢獻，畢竟，許多擁有和台灣類似待遇的國家，並沒有因此就

約。此約維持 24 年，在 1979 年廢止，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改由《台灣關係法》接手。

10 整體而言，美援對公營事業的支助遠比民營事業為多。隨著依賴理論的興起，美援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造成台灣對美國的依賴，也成為許多二手研究的焦點。相較於此，1960 到 1970 年代的著作多半強調美援對台灣經濟奇蹟的正面貢獻，批判和反省的聲音相對闕如。有關美援對台灣的影响評論，見文馨瑩(1990)與趙既昌(1985)的有關評析。

創造出經濟奇蹟，這個差別已經說明「人的決策」可能具有的重要性。

一般在討論美援對台灣的影響時，多半會認可美援是促使台灣走向發展掛帥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 的重要條件 (Amsden 1985; Wade 1990; Onis 1991)。本文無意否定這個立論，也無意否認，威權政體的建立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做為條件，才能完成侍從體制的建構。¹¹ 沒有經濟發展上的成功，國民黨政府以軍事戒嚴方式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必將遭受嚴肅挑戰。畢竟，二二八事件埋下的緊張，和 1950 年後出現於台灣的政治和族群不平等問題，勢必會糾纏在一起，軍事戒嚴能否獨力克制民眾反抗的出現，不無疑問。必須慶幸的是，台灣沒有陷入軍事政變或人民武裝反抗政府的惡性循環，這和經濟生產條件的改善與人民財富的增加有直接關係。當然，這個說法可能窄化人民不反抗的原因，簡化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但經濟條件的改善確實也是侍從關係外，國民黨用力最多之處。「拚經濟」會成為台灣執政者偏愛的口號，不是沒有道理。也因為經濟成就具有的證成作用，美援對穩定台灣政權的貢獻不言可喻。不過，就本文的立論而言，我更希望顯示的是美援對戰時體制的維繫作用。因為從 1951 年開始，美援就不只在軍事武備上表現出美國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也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精神上維護國民黨的軍事獨裁，以軍事治理帶來的社會安定，協助美國鞏固其在東亞的領導地位。我們可以想見，沒有美蘇兩大霸權的對立和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不會立刻重新武裝台灣，也不會以經濟援助和最惠國待遇讓台灣脫貧致富。對美國而言，戰時體制或許不民主，但「親美」在此刻實比「民主」更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此而言，美援等於是在物質的基礎上創造戰時體制的維生條件，使其不虞匱乏地繼續將動員戡亂體制實施於台灣社會。

很顯然地，受惠於台美之間的刀劍同盟，台灣取得後進發展國家

11 有關威權統治和侍從主義在台灣的發展討論，見王振寰(1989)、Nai-teh Wu(1987)、若林正文(2009)的檢討。

需要的資本、技術與海外市場。雖然失去反攻大陸的自主機會，台灣卻也因為美國的東亞戰略，與第七艦隊的巡防台灣海峽，而獲得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安全保障。這是維繫戰時體制的重要條件，也是孕育台灣經濟奇蹟的關鍵條件。聲稱台灣是冷戰體系的受益者，並非誇大說法。不過，這不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受惠。要全面檢討冷戰對台灣造成的利弊得失並非容易之事，除了涉及的層面廣泛外，隨著時間的拉長，冷戰造成的遺緒和後冷戰時期台灣經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演變等，都會讓這種評估變得不易。畢竟，時間本身就構成嚴格的考驗，有多少此刻看來明確的答案，在將來還能維持一定精準，這個問題著實不易回答。本文對冷戰的結果評論也難逃這個檢驗。在無意也不能過度放大本文的討論範圍下，我將只就高等教育的發展來評定冷戰對台灣的影響。即便如此，要做到鉅細靡遺和分門別類的評估並不容易，因為這裡頭還交錯著國共內戰的因素，和國民黨政權要立足台灣，收編台灣社會的動作。很多時候，這三者是彼此牽連在一起，形成連動影響。以冷戰和內戰而言，「反共」是其共同的利益和語言，這個交集也呈顯、滲透在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社會的征服上。在高等教育的發展中，左派意識的缺席與大學的訓導化走向，都反映這個細密牽連。

確實，拿掉冷戰和美援的因素，我們將無法對台灣的第一次大學數量擴充進行完整解釋，也無法對後來的高等教育走向做清楚說明。以因果性來說，沒有冷戰體系的架構，和台美之間高密度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聯盟建構，台灣難以在 1950 年代，以自身的力量建立經濟發展需要的資本積累與技術突破，更遑論以廣大的美國市場來消化「以農養工」的果實。說這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特定產物並不為過，因為後來的歷史再難出現類似景況。也是在如此的特殊環境下，台灣的教育體系開始出現人力資源的培育觀念。不過，這是有時間落差的表現，因為截至 1960 年以前，經濟發展需要的人力需求都還沒有驅迫教育體系做相對應的改變。1962 年史丹佛研究所經濟發展處來台灣做教育制度與人力調查時，就清楚指出，「迄今為止，教育與經濟所需

之人力甚少配合」。「在研究本問題時，曾與教育及其他機關代表暨公私企業組織代表會談，過去甚少注意發展人力資源，以充實各種經濟計畫所需人員之詳細設計」。「現在尚無機構作定期性之詳密人力預測，以便釐定長期與短期之訓練方案。各學校不得不依規定之課程標準授課，往往與社會經濟之環境甚少關聯」（美國加州史丹福研究所 1962: 5, 7）。這個欠缺連帶的事實說明，「以農養工」的政策還沒有在教育領域造成驅動作用。以當時的中等以上學校數目來說，普通中學為職業學校的兩倍有餘，這個分配顯示，配合經濟發展的技職教育還未成為歷史的主角。這個事實說明，此刻的台灣還沒有將人力資源視為積累體制的一環。對執政者而言，反攻大陸的軍事目標還是比經濟發展更有吸引力。

雖然有時間落差，以冷戰體系和美援資本做為條件的經濟生產，還是在 1960 年代凌駕並主導台灣的教育發展。關鍵的動作是 1960 年因應美援將要終止而提出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這個攸關台灣經濟發展的改革方案，主要是以財政和經濟的獨立自主做為努力方向，但其實踐牽動著教育對經濟的人力資源提供。沒有後者的搭配，前者難以獨立成事。畢竟，財經改革的成功不能只仰賴擊劃者，沒有執行者與生產者，這些措施難以付諸實現。認識到這個需求，1962 年召開的第四屆全國教育會議，也決定將加強經濟與教育計畫的聯繫，實施科學教育和改進高等教育等，列為國家教育目標。配合著第三期（1961-1964 年）和第四期（1965-1968 年）的經濟建設計畫，技術人才的培育成為重點。1963 年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合會）後，人力發展規劃成為該會重要工作。在經合會的主導下，配合經濟發展的分流教育變成台灣教育的主要方向。按 1968 年經合會擬定的人力發展計畫，1977 年時台灣的高中與高職、五專的入學人數組成比例，將從 1967 年的 5.1 比 4.9 調整為 4 比 6。1972 年提出的人力發展計畫，更規劃要在 1981 年時將比例調整為 3 比 7（聯合報 1995）。這個人為劃定後來確實成為政策，也埋下 1994 年民間教育改革運動的爆發種子。也在這個階段，高等教育的科系設立被要

求需與經濟發展相配合，與科學技術有關者優先增設，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相對遭受冷遇。¹²在發展勞力密集產業的政策下，高等教育在1986年以前始終未能再有大幅增加。從1965年的21所大學與獨立學院，到1986年時只增加了7所大學與獨立學院。大學的窄門正跟隨著戰後人口的增加，變得愈來愈難進入。

上述的分析說明，冷戰體系其實隱隱然主導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除了在「反共」的立場上與動員戡亂體制同一陣線外，美援的提供也在財政、經濟和技術的領域，醞釀台灣經濟奇蹟的誕生。這個奇蹟路線的製造，在交錯技術官僚的智慧與決斷後，深刻影響當時的教育體系發展。高等教育的走向，不管是它受到的政治和思想管制，還是功利主義式的運用與定位，都和冷戰的在地化脫離不了關係。為了將台灣牢固地納入美國的東亞戰略佈署，成為美國國力在東亞的延伸，一些非官方性的連帶也在台美之間架構起來。以高等教育來說，各種基金會的穿梭台灣和其形成的「親美」效果，值得再做省視。檢討這個過程不是要否認善意的存在，也不是要非難基金會的作為。歷史研究只是要讓曾經存在過的事實與圖像，盡可能地再現出來而已。

三、匱乏中的溫暖

從冷戰時期到台美斷交之前，台灣的高等教育和各式研究確實深受美國的影響。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社會科學，美國都成為台灣在知識、技術、訓練和課題開發上的學習與合作對象。如果說美援構成外資的唯一形式與管道，挹注台灣的經濟發展，美國的學術界和支持學術交流的金主，無疑也在這個階段扶持了台灣的學術發展，並點滴地讓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產生關連。這個現象的出現，和美國的經營冷

12 一個明顯的相關例子是，經合會曾經答應長科會（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將以四年(1966-1969)的時間提供一億元基金，籌設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和工程研究等五個研究中心，給予設備、講座、出國進修、舉辦研討會和中美院校合作計畫的補助，這裡頭欠缺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類似經費挹注。相關的研議過程，見楊翠華(1999: 53)。

戰有直接關係，也和台灣試圖透過學術交流獲取知識和技術資源，拉高台美之間的政治密度有直接關連。1970 年後，中美關係的改善多少影響美國繼續「投資」台灣的動作，官方經費的中止和交流計畫的減少，並沒有立即影響學術界和高等教育界對美國的知識和技術依賴。之所以出現如此的路徑依賴，和三個原因的持續效用有關。第一是，隨著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中國和日本的學術交流中斷。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後，基於「再殖民」的政治需要，也刻意割斷台灣和日本的既有關連。另外，大戰的發生也讓日本和歐洲都不再有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以日本和以歐洲為師的動機與需要也於焉中斷。¹³ 當然，這個短暫的中止和美援的入駐台灣有直接關係。在美國共同安全總署（後改名為國外業務總署、國際合作總署、國際開發總署）中國分署的主導下，台灣已然失去（也不需要）其他的知識和技術接觸管道。沒有替代選擇是路徑依賴能出現的部分原因。

另外，從 1951 年開始，在共同安全法案、史墨法案和傅爾布萊特教育交換法案的支持下，台灣陸續派出將近萬名的學者、專家、教師、官員、學生和軍人等赴美考察、訪問、見習與深造。¹⁴ 這為期近二十年的交流與交換學習，鑄造了不少社會菁英的親美立場。按趙綺娜的整理，在共同安全法案的經費支持下，1951-1970 年間，台灣赴美國或第三國受訓、考察、見習與深造的人數共有 2988 人；到 1960 年，軍人赴美受訓的至少有六千餘人。史墨法案的部分，1952-1961 年間，以專家和領袖名義赴美訪問的有 198 人。傅爾布萊特教育交換法案部分，1958-1967 年間，共有 92 名大學教授和研究學者，以及 168

13 以 1952 年為例，當年度教育部核准出國的留學生中，日本的名額為 0，美國為 360 位，法國 2 位，英國和德國也是 0。1962 年，核准留日的學生有 273 位，留美的則有 1387 位，留學法國的有 14 位，英國 8 位，德國則增加為 43 位。這個懸殊比例後來一直未曾改變。1982 年時，核准留日的學生為 118 位，美國為 5,572 位，法國為 42 位，英國 21 位，德國 65 位（教育部編 2000: 60-61）。

14 共同安全法案的前身為 1948 年的援華法案，1951 年改成現名，這也是美援的依據。史墨法案成立於 1948 年，為典型的冷戰產物，1952 年開始運用在台灣，其目的是要讓台灣人民更了解美國，並在教育和專業上增加彼此的友善交往。傅爾布萊特法案通過於 1946 年，1958 年開始使用在台灣，這也是目前台美之間唯一繼續存在的教育交換計畫。有關這三個法案的成立與應用於台灣的過程，見趙綺娜 (2001) 的說明。

名學生獲得經費支助，赴美進修（趙綺娜 2001: 95-100）。¹⁵ 這些交流成果和其產製的「認識美國」作用，在 1970 年代依舊發揮效用。台灣對美國的學術與文化依賴，並沒有因為美援的終止而另起爐灶。由於長期受惠，台灣的不少政府單位、研究機構和大學甚至習慣以美援做為經費支助來源。在美援停止後，這個習慣繼續存在。1967 年，時任總統府「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吳大猷，也不得不感慨，伸手請人補助已經成為各單位和機構的習慣（吳大猷 1972: 9）。這個積習顯然需要時間來調整，但它的普遍也說明，美援確實是許多制度、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源能在台灣生根的原因。以 1959 年成立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1969 年改名為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來說，其初期的經費有 96.7% 皆來自美援，到美援停止時，每年的預算平均 86.3% 皆仰賴美援（張朋園 1984: 26-27）。這個高額比例已然說明美援對台灣學術發展的重要。

不過，在反省路徑依賴的問題時，也不能忽略非官方領域的民間基金會，對台灣高等教育和學術界的支助與影響。這裡頭主要以亞洲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最具代表性。¹⁶ 在物資匱乏的 1950 年代，這些基金會確實在不同的領域、範圍和社會事業上，提供台灣大小額度的經濟支助，使台灣社會產生點點滴滴的改變。由於本文只以高等教育做為範圍，呈顯在教育領域外的變化將不在議論之列。以性質來說，這三個基金會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如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世界展望會、基督教青年會、紅十字會等一樣，都屬於民間機構，但後者因為具有宗教成分，或以世俗救援為職責，人道援助和緊急災害救助為其主要特色。相較於此，國際救援和社會福利不是這三個基金會的成立目的。以亞洲基金會的設立來說，它明顯是冷戰的產物。洛克斐勒和福特基金會雖然是私人捐助的基金會，但在推動

15 美援雖然終止於 1965 年，但部分以美援為經費的教育交換活動仍持續到 1971 年。

16 除此之外，哈佛燕京學社在 1957-1971 年間也曾透過在台灣成立的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陸續支助台灣的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共計 43 萬美元執行 201 個研究計畫，並設立獎學金，補助學人與學生赴美研究（張朋園 1984: 28-29）。

人群服務和社會發展工作時，也不乏形象經營、開拓市場和配合政府進行全球戰略佈署的動作。說他們忠誠地執行美國的國策與戰略佈署，或許不盡公允，但他們支持的國際交流與經濟開發活動，多半和美國的利益息息相關，也和其國策遙相呼應，倒是不爭的事實。某種程度上，他們扮演的角色十分類似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所說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這也就是說，無關乎它的民間屬性，它與官方機制一樣，都有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和協助美國經營冷戰的作用。這個特質在三個基金會的運作中都清晰可見。

就是在如此的目標下，美國政府在 1951 年成立了「自由亞洲委員會」，1954 年改組為亞洲基金會 (The Asia Foundation，縮寫為 TAF)。雖然定位為民間非營利的法人組織，亞洲基金會的主要目的，是要協助美國政府推動其在亞洲國家進行的人道援助，並在「發展」和「外交政策」的考量下，從事各種資助計畫。除了向民間募款外，1967 年以前，基金會的部分經費來自聯邦政府的直接挹注。「1968 年至 1978 年期間，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USAID) 與國務院的教育與文化事務局兩個政府單位是 TAF 的經費主要來源，尤其前者的比例最重；到了 1979 年以後，國務院取代國際開發總署成為 TAF 一般性經費的提供者」（官有垣 2004: 27）。就經費的來源而言，它其實是美國政府進行「發展亞洲」的白手套。與官方機構不同的是，它維持較具彈性的人事聘用，也具有一定的規劃與推動資助計畫的自主性。它在亞洲的辦事處多半能因地制宜地辦理捐贈和資助活動。除了各類小額資金的贈與外，亞洲贈書計畫從 1954 年至今，總共捐出超過 3,600 萬冊的書籍、期刊和其他軟體給亞洲地區的 40 個國家。前後至今，共有 5 萬個機構接受過相關的贈書活動（官有垣 2004: 30-31）。¹⁷ 整體而言，亞洲基金會的捐贈範圍、對象和種類十分廣泛，小額捐贈為其特色，以此催化在地社會的自我發展是其目的。

17 台灣的部分，到 1980 年左右，各學術機構收到的英文贈書大約 35 萬餘冊（張朋園 1984: 32）。

以總經費而言，從 1954 年到 1997 年的四十三年間，亞洲基金會對台灣的贈款數額大約在 1,000 萬美元，平均每年的捐贈數目約 23 萬美元上下（官有垣 2004: 32）。¹⁸ 在最初的十五年（1954-1969）中，配合發展與外交政策的需要，高等教育、人力資源發展和科學教育成爲基金會補助的主要範圍。包括中央研究院、東海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和師範大學的一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系所的成立與發展，以及教學和研究人員的進修與訓練，都有亞洲基金會的支助。¹⁹ 以東海大學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與研究所的成立來說，亞洲基金會的支助在當時都有點火、播種的效果。在經費拮据，軍費支出又佔高比例 1950 年代，這些數額不一的捐款與捐書，都有催化相關研究領域在台灣生根冒芽的作用。不可諱言，這些經費和圖書的贈與，符合美國政府的發展亞洲計畫，避免亞洲社會因爲貧窮而滋生共產主義革命的火種。拉近學術、政治和社會菁英與美國的距離，甚至開放美國的市場給戰略伙伴，是冷戰時期美國必須經營的親密關係。也在這個大戰略的庇蔭下，台灣獲得安定政權、發展經濟、培植學術和強化高等教育的本錢。戰爭具有的生產性，在亞洲基金會的「孵化」動作中，深刻留下痕跡。

同樣具有支持盟邦，同時又對台灣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環境具有扶持作用的是洛克斐勒基金會。事實上，從 1947 年開始，洛克斐勒基金會就透過農復會提供台灣瘧疾防制的經費與技術。之後，包括人口研究計畫、養豬科學研究、玉米病蟲防治、漁業研究和家庭計畫等，都曾受惠於洛克斐勒基金會的支助。截至 1974 年爲止，台灣先後獲得的經費支助達 265 萬美元（經濟日報 1974）。這部分自然也包括洛克斐勒基金會對台灣高等教育的點滴支持。除了提供台灣的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赴美進行短期訓練與研究，以及美國學者的來台

18 這個總數不包括台灣辦事處的行政管理支出。1997 年後，以本土為募款對象的「台灣亞洲基金會」成立，美國亞洲基金會的作用大幅降低。

19 有關 1954-1982 年亞洲基金會在高等教育領域的資助活動統計，見官有垣(2004: 42-43)的項目整理。

訪問外，爲了執行上述計畫，洛克斐勒基金會也在 1950 年代末補助台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進行農學和農業改良的研究。對台大圖書館學系的創立和政治大學圖書館的收藏，洛克斐勒基金會也都有所挹注。另外，中研院史語所的殷墟甲骨及漢簡研究，也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五年的專款補助。按吳翎君(2009)的統計，從 1958 年到 1973 年，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台灣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大約有 115 萬美元。²⁰ 在物質條件甚爲匱乏的 1950 年代，這些點滴的支助，都是讓台灣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能走出新路的條件。因爲，在此之前，台灣的學術界可謂「死氣沈沈」，沒有學術事業可言。1959 年，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李濟(1959)，就曾引用三位美國學者的調查報告反省台灣何以成爲「文化沙漠」。其理由極其平凡，「甲、台灣沒有學術空氣；乙、很少的，等於沒有的，研究經費；丙、低到不能維持生活的薪水；丁、出國的限制；戊、與外界隔絕的恐懼」。這種高等教育近於癱瘓的評語，同樣出現在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的口中：「那時我們整個的大學教育全無生氣，設備落後，師資空乏。（凡是從國外回來的人）無不感到惶恐，就是我們自己也都悲觀」（王世杰 1980: 469）。很顯然地，在「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政治和軍事目標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只能以最低價方式經營，「慘澹」可能都還不足以說明其艱困。

與前兩個基金會略有不同的是，福特基金會在 1962 年到 1971 年間，曾經大力贊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兩期的對現代中國的研究。在補助中研院近史所進行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和口述歷史的採集時，福特基金會也提供美國、日本、韓國和香港的學者經費，合作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組織、經濟發展、文化和法律等面向進行探討。推進美國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與掌握，是這些合作計畫預期完成的工作。由於獲得高達 42 萬美元的支助，近史所不論在圖書設備、人員進修、史料採集和研究人員的研究補助上，都獲得具體改善（中央社

20 上述的總數不含個別給予的獎學金。

1961, 1965, 1967)。²¹ 相較於此，福特基金會對大學的補助只能算是小額，關鍵作用不若其他官方與非官方基金來得明顯。不過，由此衍生的教學和研究能力增加，卻不能予以漠視。畢竟，學術發展的遞延效果，非可以用研究計畫的執行時程來衡量。有意思的是，福特基金會對中國研究的支持，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支持，與當時的美國主流利益十分貼近。以 140 萬美元支助學術機構和學者合作研究「共產中國」和其附近地區的「緊要知識」，這大概只有在冷戰時期才會出現。

上述的討論沒有窮盡 1950-1960 年代，民間基金會對台灣高等教育的資助與介入。但整體而言，美國官方和民間資金的提供，以及各種交流、交換計畫的執行，確實是台灣高等教育走出新路的條件。在多數留學生未回國任教、從事學術研究前，以美國為主的外籍「教授兵團」曾經在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路徑上，留下拓荒性足跡。事實上，包括台灣的科學發展政策和執行效果，都有明顯的美國資助痕跡，高等教育的師資培育也是其中一環。²² 這些現實說明，在教會大學的設立外，美國政府和民間基金會都有意以策略性的合作和搭配，拉近台美之間的教育與學術交流，並以此鞏固美國在東亞的政治與軍事防線。在不對等的發展位階上，台灣獲自美國的利益（包括國防、外交和經濟利益在內），其實要較美國獲自台灣的利益來得多些。當然，這個發展位階落差，和台灣本身的匱乏與需索，也加深台灣對美國的依賴，由此衍生的學術殖民爭議並不令人訝異。²³ 在一切仰望美國的年代，要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有自覺地拉開與美國的距離，甚至從傳統中或在地社會裡，產生開創性的、符合自身利益的研究成果，這是強人所難。沒有物質條件，這個期待無以落實。在台灣有足夠的

21 不過，也由於費正清對此案的大力支持，以及近史所的獨享豐厚支助，導致王世杰和郭廷以都受到牽連，被扣上出賣國家檔案的「罪名」，甚至被暗指為同情中共（因為郭廷以與費正清熟識的關係）的同路人，最後郭廷以遠走異鄉，不再回台灣。

22 除了經費外，合作計畫的執行與顧問性質的意見提供，也在其列。有關中美科學學術合作的交涉與演變過程，可見楊翠華(1999)的詳細討論。

23 1980 年代開始，學術殖民的問題才開始搬上檯面，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仍舊存在，只是在不同面向上演類似的劇碼。作者將另文討論這個問題。

經濟條件醞釀自己的研究環境前，這個弱勢都難以大幅改變。不過，經濟發展的需要勢必也會牽制，甚至主導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的取向。成功需要經濟，限制也來自經濟，這是 1965 年後，台灣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在威權體制外，必須面對的命運。

就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領域來說，台灣並沒有要自甘成爲美國的學術衛星站所，但欠缺物質條件的支持，要做翻身的動作也不容易。以高等教育的情況來說，在第一波的大學設立之前，台北帝國大學和農林、工業專門學校多以教學爲目標，研究部分並非重點，甚至即便有些微成果，也因爲語文關係而不爲國民黨政府所認可。至於搬遷來台的中央研究院，其最初的落腳地點是台北鄉下的火車站倉庫，根本無研究可言。1956 年搬遷到南港現址時，只有 10 個研究所，每個所不超過 13 位研究人員，一年的總經費不到 2,000 萬元（張朋園 1984: 25，註 6）。在政府無暇也無錢給予支持前，聊備一格成爲當時的景況。即便後來有美援的支撐與美國民間基金會的挹注，使大學的數量、教育環境和研究條件都獲得改善，但政府部門對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看重，還是差強人意。1973 年，主掌總統府科導會和行政院國科會已屆六年的吳大猷，也不得不感慨，「政府各部門，實少對科學對國家的重要，有深切認識者。尤其是各機關，從未以爲科導會及國科會是有意義及重要性者」。他即便費心費力，仍有如「蜻蜓撼大樹」般，難有作爲（轉引自楊翠華 1999: 70）。²⁴ 政府部門的漠視和冷遇，多少和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沒有迫切性，與政權生存和政治治理較少直接關連有關，但這份冷遇也更凸顯外來資金對啓動台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重要。

24 上引文係 1973 年 1 月吳大猷寫給蔣彥士的信函內容。1973 年 5 月，吳大猷帶著失望辭去國科會主委工作。

四、大學的性格

就像所有的人為體系和社會建制一樣，大學從其設立之初到現今的發展，其變異的程度真不可以道里計。對支持大學精神和大學理念的「衛道人士」來說，現今的大學發展只能以「庸俗有餘，精神不足」來評斷，但批評和抗拒的聲音並不能扭轉大學日趨功利化和商業化的走向。關鍵之因，在於現今的大學已無法遺世而獨立。國家間的競爭和民族間的競存，以及大學間的競爭和大學面對的生存壓力，都在約束大學的發展與表現。個人試圖透過高等教育來累積文化資本，營造社會流動的條件，這個世俗目的也加深大學與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關連。在承平時期的，大學面對的是來自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個人的利害計較關注。在戰爭時期，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戰爭動員的需求，經常成為大學面對的功課。縱觀二十世紀的大學體系，不管是處在資本主義的陣營，還是處在社會主義的國度，幾乎沒有一所世俗性大學能逃脫這些力量的介入。以長時程的角度來看，這種牽連和介入正以有增無減的速度在影響世界各國的大學發展。檢討歐美大學過度商業化和功利化的聲音，也不絕如縷 (Ruch 2001; Bok 2003; Kirp 2003)。即便如此，商業邏輯還是橫行無阻成為各大學採行的戰術邏輯。在「生存第一」的考量下，大學的理念、理想和精神不是被束之高閣，就是被視為殘餘，無足輕重地存活在大學的校園角落裡。這個轉變不只發生在老牌大學的產出地——歐洲和美國，也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後的台灣。

歷來討論大學的精神與理念時，1852年出版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無疑是最經典的著作。在紅衣主教紐曼(John Henry Newman)的闡述下，大學做為一個教授全面知識和實現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所在地，其目的是要在教育中訓練和培養心智，開闊眼界，使人具備社會互動和人際交往的能力。在紐曼的眼中，功利性、商業性和實用性的設想，應該遠離大學教育，而國家的

需要和生產體系的運作也不應成爲大學的目的。必須獨立於後兩者的羈絆，大學的目標才能顯現 (Newman 2003)。²⁵ 顯然，這是一個近似「不食人間煙火」地對大學使命的論斷。後來的大學發展明顯是朝著紐曼最不願意見到的方向演進。不過，也因爲他將大學的鵠的設定在人的心智培養，使大學的功能超出狹窄的功利範圍，後來對高等教育做爲公共領域的討論，再難超越他的高度。事實上，面對現今大學的世俗化走向，甚至缺少核心價值，任憑市場機制擺佈的狀況，紐曼的理念和理想只是一個「回不去」的理想國。但這個對照也清楚暴露，二十世紀的大學是如何在埋葬自身理想的過程中快速長大。雖然不是針對大學體系做批評，盧梭的立場——「這個社會應該好好瞧瞧自己，並且覺悟自己在道德腐敗的路上，已經多麼迷途忘返！」——在此無疑十分貼切 (McClelland 2000: 316)。大學的「走調」勢必自大學的精神離散開始，這個提點即便精確，也阻止不了國家和市場經濟對大學的覬覦與調動。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清楚顯示這一幕幕的演變。

另外一個和大學的性格與理想直接相關的討論是，雅士培 (Karl Jaspers) 在 1946 年寫就的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在這本書中，雅士培堅持大學應該以追求真理做爲主要目標，在學術自由的基礎上完成教學、研究和創造性的文化生活的連結發展。大學雖然不能脫離於社會而存在，但它不能以國家和民族主義做爲服侍對象。雅士培不否認國家和大學之間總是處在緊張狀態，有時甚至是公開的衝突與對立。國家可以輕易地摧毀和關閉大學，而它也總是試著將自身偏好的信仰加諸在大學身上。如何立基在社會和時代良知的立場上，在知識和真理的範圍中與國家抗衡，是大學必須進行的任務 (Jaspers 1965)。雅士培沒有如紐曼那般否認實用性知識在大學的位置，但他壓根不認爲前者可以做爲大學教育的主流。能在納粹當道的年代，堅持學術自由與學術獨立的必要，雅士培確實有過人的道德勇氣。但歷史並沒有因爲他的宣示而停留下來，來自國家和經濟生產體系，乃至個人的世

25 1996 年耶魯大學再版本書時，特別收錄 5 篇針對《大學的理念》寫就的評論，十分值得一讀。

俗欲求都沒有因此而歇下腳步。在冷戰旗幟高掛的年代，國家更不會從高等教育中抽身而出。它或許不會如法西斯國家那般極權、強制，但看管，並將大學納入國家生存競爭的一環，這個企圖和動作肯定不會缺席。

在中國，大學的誕生和民族的興亡一直牽連在一起。從 1898 年京師大學堂設立開始，「維新」和「求存」就成為大學發展的潛規則。在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學的時期（1916-1927 年），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和兼容並蓄的辦學作風，曾經成為一時典範。²⁶ 但即便如此，惡劣的政治風氣和跋扈的官僚政府，仍舊讓蔡元培感嘆再三，並在 1927 年辭去學術地位甚高的北大校長工作。大約也在相近時刻，中國結束軍閥割據狀態，開始變成有單一中央政府的國家。不過，在國民政府開始實施訓政時，戰爭也如影隨形地糾纏著南京的領導人。除了蘇區的割據外，東北的淪陷和抗日戰爭的發生，以及後來的國共內戰，都讓國民政府窮於應戰。戰爭的勝敗牽涉到政權的存亡，政權的存亡攸關著民族的前途，連鎖反應下，大學自然難有獨立自由的空間。特別在國共內戰時期，大學成為雙方鬥爭的場所。一波波的學潮翻動的不只是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正當性，也讓大學成為政治力量肆無忌憚穿透的場域。以半世紀的時段來看，中國的大學，從其成立之初就和「反殖民、反侵略」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隨著日本的入侵中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成為重要符號，影響著大學的發展與定位。因為戰爭，大學欠缺安定的環境與足夠的經費；因為戰爭，大學將自己視為民族復興的基地。不管是前者或後者，大學都受害甚深。如果說大學的成立是西方現代性在中國的移植和表現，過度政治化顯然是它難以擺脫的時代特性。1950 年後，這個特質更是明顯，因為在群眾運動的過程中，學術自由已無縫隙存在。

上述的宏觀考察說明，從大學的理念鑄造到大學的現實發展間，

26 有興趣於考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大學精神演變歷程的讀者，可以參考楊東平編(2001)的相關論著。

一直存在內在緊張。二十世紀的大學，面對的問題可謂錯綜複雜，要按紐曼和雅士培的路徑重整旗鼓，並非易事。畢竟，隨著時間的遞延，大學不但面對數量的巨幅增加，也面對質量的改變事實。這兩個變化都不是紐曼和雅士培曾經預見的結果。二戰之後，隨著新興民族國家的出現，和老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需要，高等教育的投資成爲營造國家競爭力的本錢。在人力素質即國力資本的考量下，教育人民成爲政府的責任。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如此，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更是必須透過人力資源的開發來加速經濟體質的轉型。當然，冷戰體系的構造也讓美國願意提供經費，在教育合作和科學研究的領域上，協助盟國發展經濟生產，改善自己的體質。沒有適當的人力資本，經濟發展勢必面臨轉型瓶頸。這個鐵律讓高等教育浮出檯面，成爲二十世紀下半業各國競相投注的「產業」。如何讓高等教育配合國家建設與經濟生產的需要，變成熱門討論議題。在此階段，紐曼的理念遭遇嚴酷挑戰。「無用之用，是爲大用」的知識，開始受到有效性質疑。大學做爲心智培養場所的理念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有實用價值，並在就業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知識與訓練。知識的價值化與價格化跟隨市場的脈動大步前進，並以有增無減的速度橫掃各地。做爲冷戰體系的一員，和以世界市場做爲取向的台灣，自然無法逃脫這個格局。也是在如此的情境下，台灣出現第一波的高等教育擴張。

在評論台灣的大學性格時，歷史的發生脈絡和大學的理念同樣重要。偏重強調任何一方的決定作用可能都冒著低估另外一方的風險，從而形成偏失的判斷。在高等教育進行第一波擴張時，台灣不是處在承平階段。政權的流離失所和民眾預期台灣遲早會被共產黨佔領的心態，都讓消極氣氛達到頂點。1950年代中期，因著軍事聯盟的建立，台灣逐步走出「血洗」與「解放」的陰影，開始在行政的領域建立國家直接支配社會的能力。國家必須建立其意志和權力的下層建築，這在社會學的討論中已有定論，Charles Tilly (1992) 和 Michael Mann (1988) 的討論爲其代表。也在這個過程中，國民黨政權開始在台灣重啓高等

教育的爐灶，希望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領域培育國家需要的人才。由於政府財政拮据，加上外交關係的考慮，私立大學，特別是教會大學，也成為政府倚恃育才的所在。不過，和公立大學一樣，私立大學也受到重重法令約束，除了所有權不一樣外，其餘皆在教育部的管轄範圍內。由於日治時期，台灣即無私人興學的傳統，也無歐美教會辦學或企業興學的自主歷史，大學和獨立學院幾乎是在政府一手主導或許可下孳生出來的。政權的換手和欠缺高等教育的傳統，都讓國民黨政府能輕易地將大陸執政時期制訂的法規應用在台灣身上。由於動員戡亂的氛圍濃厚，加上軍管的措施，要質疑和挑戰這些教育法規並無條件。在教育的領域裡，大學和獨立學院的設立無疑是政府的特許。沒有黨政關係和政府的點頭，私人興學將如空中樓閣般難以實現。

除了法規的約制和特許權的壟斷外，台灣的高等教育還受到兩個力量的強力干預，使其難以走向紐曼和雅士培冀望的道路。一個是來自國家對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箝制與迫害，一個是來自計畫經濟對高等教育的切割與擺佈。後者多少也顯現在大學數量的特許管制上。在思想和學術自由的箝制部分，過去的討論已經所在多有。所有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批判，不管是顯現在大中國主義的意識型態灌輸、教科書的審定、必修課程的制訂、軍訓課程的實施、教官和安全體系的入駐校園，乃至學生社團的設立和對自由主義學者的看管，這些不一而足的動作都顯示，國民黨政權對高等教育心存不安。不過，這份不安不能全然歸咎於共產黨可能透過學潮，鼓動學生造反的說法上。在國共內戰時期，大學確實成為共產黨經營第二戰線的戰場，而他也成功打贏這場戰爭，讓青年學子投向共產黨的懷抱。內戰的快速失利，和民心的向背與學生的作對是有直接關係。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說法，其實簡單化了這個問題，因為它只是將共產黨當作國民黨可以恣意管制大學的便宜理由。

拿共產黨當墊背，在那個年代經常可見，但不爭的事實是，從1955年後台灣的治安機關就沒有再破獲重大的匪諜案件。「抓匪諜」只是對付異議人士的手段（黃金麟 2009）。就此而言，擔心共產黨侵

入校園，鼓動學潮只是一個門面理由。真正的關鍵是，國民黨不容「一黨專政」的作為被人民所質疑。在以出版法管制媒體和出版業後，大學的講堂和校園成爲最難管束的地方。這也是爲什麼國民黨政權要擺置這麼多的「重兵」（加上法規和制度）來管制大學的原因。國民黨十分清楚，他需要投資並利用高等教育來鞏固政權，但他也了然於心，高等教育可能教導出一批跟他唱反調的學生。啓蒙和育才的結果可能不如執政者之意，這是國民黨力圖避免的結果。這個謹慎與焦慮使台灣的大學面對三十餘年的嚴格管制。大學做爲追求真理的場所，這個理想被執政者有意識地凍結了一半。當然，這裡所說的一半是指與政治有關的一半，與政治無涉的另一半則依專業和經濟邏輯繼續發展。但有權力壓制的地方，就有反抗和逃逸，這個命題在傅科 (Michel Foucault) (1978) 和史考特 (James Scott) (1985) 的研究中都有精彩論述。短暫的噤聲和冷漠不代表心悅誠服。被壓抑的聲音總會在其他地方找到出口，甚至集結成地下性的不滿。沒有決戰，不代表游擊戰沒有發生。國民黨可以一廂情願地以強制手段壓抑學術自由，甚至以利誘方式分化大學社群，但大學的精神和理念也因此而顯得珍貴、高尚。有信仰就會有志士和烈士，秉承「革命」信仰的國民黨此刻已經忘記這個基本道理。

不過，在申論這個命題時也不應該將大學獨立於社會整體的浮動來觀看。大學內部即便有秉持大學理念的聲音存在，甚至以此批評政府對大學教育的片面干預，但這些批評往往也和時政的發展聯繫在一起。「批評時政」——不管是在大學的講堂上，還是在報紙雜誌的版面上——往往成爲「自由派學者」的標記，也成爲政府不願放鬆的管制地帶。畢竟，時政的好壞反映的就是政府的執政能力與正當性。面對反攻大陸的口號化發展，軍事管制對公民權利的戕害，乃至社會經濟領域裡出現的階級剝削，以社會良知自命的知識分子自然無法噤聲不語。但「說真話」的動作，不管是以講學、研究的形式，還是社會輿論的方式，都可能踩到執政者的政治紅線。爲了減少異議聲音的出現和流傳，國民黨政府不但管制大學的講堂，也管制所有的出版管

道。殷海光和雷震的遭遇正是典型代表。即便如此，堅持大學應該關心社會，議論時政的聲音和動作，仍然點滴存在。各種流通禁書的管道也沒有因為出版法的執行就消失無蹤。這個事實說明，大學的社會責任正成為雙方的緊張所在。政府希望大學能「忠黨愛國」，但後者並不以此為自身價值。為了彌平這個落差，國民黨政府只能以中央集權的教育政策和人事法規來馴化大學的「不安分」，甚至舞動戒嚴的旗幟來達到消音的效果。這不光彩的一頁影響大學的性格甚深，不能就此遺忘。

大學的不自由反映的是社會的不自由，這裡頭沒有時間和空間落差。在 1950 到 1980 年代初期，這幾乎是台灣的普遍寫照。這種不自由同樣也表現在計畫經濟對高等教育的計畫發展上。不過，這個不自由宣稱不能過度放大，畢竟，經濟發展有其自身需要。即便有政權生存的考慮存在，經濟的需要還是鮮明可見。但對大學而言，服務於經濟需要已經成為長期宿命。從美援入注高等教育開始，依經濟發展的需求設立新的系所和研究中心，甚至評估舊有的學門和訓練是否能滿足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就成為理所當然之事。1962 年，受亞洲基金會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援華公署贊助在台灣進行調查研究的史丹佛研究小組，就明白指出，台灣的教育與經濟發展需要的人力「甚少配合」。它的具體建議是，「教育部應與經濟部、美援運用委員會、內政部、財政部及國防部覓取合作，以便對國家發展計畫所需之人力需求，做繼續不斷之設計」（美國加州史丹福研究所 1962: 6）。由此開始，人力資源開發變成「國家忠誠」外教育的另外一個目的。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規劃分流教育，甚至在知識和技術的層次培養「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需要的人力，成為往後高等教育的重要方向。確實，沒有足夠的人力素質，台灣難以在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上尋求突破，這個道理支配往後半世紀台灣高等教育的走向。

有意思的是，教育做為國家理性的表現場所，它不只凝聚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與經濟需要。在 1960 年代，它同時還是冷戰體系必然要計較與攻佔的領域。台灣的高等教育和早期的學術研究明顯表露這個

特質。以 1965 年後設立的六個研究中心來說，台灣大學設立的是數學、化學和農業研究中心，清華則是物理研究中心，成功大學設立工程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則有生物研究中心。以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做為中美科學學術合作的具體成果，它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和高等教育的板塊配置，無疑具有深遠影響。畢竟，這些領域到目前為止都還由這些大學和研究機構執其牛耳，而他們也不負所望地培養數百位碩博士生，參與台灣的建設工作。在初期的教學和研究中，美方學者都是重要助力。對正在經營冷戰體系的美國政府而言，這是「發展台灣」，使台灣在政治、經濟和學術上依賴美國，財政上獨立於美國的必要動作。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也透過政府和民間基金會的資助，參與於台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不管是主動的贊助還是被動的邀約，美國都以「不缺席」的姿態參與於台灣的高等教育建設。當然，這些贊助金額未必大到可以獨立支持這些學門和機構的設立，政府的經費和學費的收入才是長期來源。但在物資匱乏的年代，這些經費都有鼓勵學門與學系成立的作用。做為拋磚引玉的種子錢，它們已經發揮啓動作用。也因為如此，在台灣高等教育的體制建構過程中，美國遠比其他國家都有影響力。除了提供赴美深造與進修的獎學金外，在地性的扶持人文和社會科學發展，並提供短期性的交換教師，也加強美國與台灣學術社群的連帶。影響所及，台灣的大學也以美國的大學做為制度學習對象。從課程設計到教科用書，都不乏美國身影。1980 年前後，台灣幾乎可以透過海盜版同步在大學講堂中使用美國大學的教科用書。流風所及，台灣學生對美國社會的認識可能比自身社會還多。對黑白種族問題可以朗朗上口，對台灣的原漢族群問題卻難有深入發言，這是台灣付出的代價。基於歷史的複雜性，作者無意用殖民一反殖民的術語，或簡單的「反霸權」立場，一筆交代這個多因混雜的過程。畢竟，在一切向美看齊時，台灣的高等教育也獲得過去難有的資源與知識。這個過程很難以內造（即未受外力干預）的方式獨力完成。當然，美國的援助有其戰略考量，它不是免費的午餐，也不是人

道的「濟貧」。培養台灣菁英的親美立場，營造以美國為馬首的世界體系，是這些援助的出發點。教育和學術不能成為戰略上的空白，做為東亞冷戰陣營的龍頭，美國對此了然於心。

在 1980 年代，本土化的呼聲出現前，這個不對等的交流一直支配著台灣的高等教育。從教學到研究，美國的學術思潮、風尚、理論和研究方法都成為學者學習和模仿的對象。自然科學如此，最需要在地考量的人文和社會科學也是如此。在傳統不足為恃，現代學術根基又未開出的年代，這種一面倒的學習態勢實難避免。另外，考量到當時的學術氛圍還深受政治權力的刻意箝制，要走出自由、自主的道路也欠缺條件。這種先天不足，後天又受限制的教育環境，是當時的學術現實。由於欠缺自立能力，台灣變成美國主流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輸出消費市場。從經濟學的偏好計量經濟學研究，同時引入凱因斯的貨幣理論和海耶克的自由市場辯論，到社會學的提出現代化理論，暗示一條從傳統到現代的單一發展道路，乃至心理學和人類學的美式研究取向等，移植、加工和應用這些理論與問題意識變成普遍傾向。這些不一而足的學習與引用，是「從無到有」的演變不易避免的過程。在環境不如人的情況下，我們無須苛責時人的取經作為。事實上，「挾洋自重」還是當時的學界能說服當道，突破政治保守心態，設立新學門或學系的條件。以台大社會學系的設立來說，其關鍵就在於楊懋春取得亞洲基金會的贊助，教育部才點頭同意。為了突破政府當局「對社會學的疑慮（如與社會主義的聯想）與顧慮（如學生的出路問題）」，他們不但強調「社會學是廣被國際承認的基本學科，是實用的科學、有解決社會問題的實效」，同時，「還訴諸與匪競爭的政治作用，主張如果無法有合格的對等單位展開國際合作，將不利我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湯志傑 2008）。在經濟掛帥，政府官員又無見識的情況下，要打破人文與社會科學知識「無用論」的短淺目光，楊懋春等人可謂用心良苦。

上述的歷程說明，從第一波大學的設立開始，加強經濟與教育的緊密結合，使教育服務於國家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就成為高等教育

使命所在。受惠於美援和美國基金會的資助，台灣的高等教育才能在政府經費運用的順序中取得一席之地，但美援的目標也讓高等教育產生不平衡發展。在「發展台灣」和「建立盟邦」的戰略考量下，各種實用性和實利性的知識受到強力肯定。理、工、醫、農、傳播和管理學門的知識成爲高等教育的重點，獲得資金挹注也相對較早、較多。檢視 1960 年代的中美科學學術合作計畫，和各個民間基金會的資助項目，都不難發現這個偏重。考量到這些領域的知識、技術和人才培育，與美援的目標和台灣正在進行的計畫經濟有高度貼合，這個偏向不難理解。對國民黨政府而言，這些知識和人力的培育也有助於政權的維繫，取得優先性自有其合理性。說這是國府與美方的共謀、共識，並不爲過。畢竟，這類知識具有技術性掌控世界的作用，它的實用性符合國家治理的需要，也符合美國領導東亞國家，建立政治、經濟與軍事同盟的需要。這種跨國的利益一致，讓高等教育難以擺脫國家的算計，形成獨立自主的空間。因爲，從一開頭，知識的兌現性和人才培育的利益計算就隱含其中。不管是舊的學門（如中文、歷史、哲學），還是新的學門（如經濟學、社會學），都必須向國家證明自己的存在必要，並繳出人才培育的成績單。這種以國爲主、以經濟生產爲重的教育路向，一直支配著台灣的高等教育。即使受到質疑，這個方向到目前爲止都沒有改變。

就大學的性格而言，台灣的大學體系從成立之初就沒有自主空間。即便受惠於美援和美式基金會的資助，美國大學擁有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特別是伴隨 1960 年代學生運動而來的反叛氣息，並不會透過中美學術交流計畫傳遞到台灣。對美國而言，這可能是損人又不利己的動作，也不符合它的東亞戰略需要。在國府禁絕學術和思想自由，美國也無意輸出「自由和人權」的情況下，台灣的大學體系只能以受制於人的位置，表現大學的零星風骨。在威權政體下，大學只能以世俗的價值和功利表現證明自己的存在必要，並爭取經費和補助。成爲國家的工具，也成爲積累體制的一環，是此刻大學被賦予的任務，而不少大學的行政體系也確實表現這種忠誠。相對於此，紐曼

和雅士培的理想與理念只能以十分卑微或個人的形式，點滴存在大學校園中。在大學沒有自由的年代，心智的培養、獨立判斷能力的鍛造和追求真理的毅力，只能在個人層次表現。在1960年代前後的台灣，這股精神只能以潛流的方式隱藏在大學校園。包括胡適等人都十分清楚，台灣的大學（特別是公立大學）已如籠中之鳥，沒有自由可言。胡適只能將自由獨立的傳統寄望於私立大學。「我以為私立學校有其優點，它比較自由，更少限制，所以我希望東海能有一個好榜樣，把握著自由獨立的傳統，以為其他各校的模範，因為只有在自由獨立的原則下，才能有高價值的創造，這也就是我今天所希望於諸位的」（胡適 2001: 79）。但私立大學也和公立大學一樣，受到國家機器的重重看管。1971年，中國基督教聯合董事會的經費撤離東海後，這所曾是台灣最優秀的私立大學也開始受到教育法令的層層綑綁，失去胡適期待看到的自由獨立條件。

五、殘缺的正義

上述的討論已經說明，從第一波高等教育的擴張開始，大學的理念就被束之高閣。不管是紐曼的版本還是雅士培的宣示，在動員戡亂的體制下，和美國經營東亞冷戰的盤算下，大學的理念和理想都無由伸張。在投資高等教育的過程中，人力，而不是「人」，才是政府注意的目標。這個立場同樣表現在美國對台灣高等教育的關注和扶持上。現實的利害計算與投資報酬率的評估，一直佔據主導地位。這種功利考量使台灣的大學體系獲得關愛眼神，也獲得發展教學和研究的物質條件。即便不足，但總比過去有所長進。但這份關愛和投注有明顯的方向性。它是政策的產物，而不是來自大學的需要。在人力即國力的現實考慮下，與政權生存和經濟發展需要的人力培育成爲重點。可能挑戰政權生存的知識和領域，則成爲政治禁區，遭受冷遇。政策與資源的同步配置，讓大學的世俗與功利作用快速表現出來。連帶產生的是知識與就業競爭力的關連發展，和文憑與就業薪資關係的區隔

表現。大學做為社會身份和經濟所得的晉升之階，於焉確立。在台灣，這個走向的出現和「雙重內戰」的經營，與冷戰體系的營造有直接關係。²⁷ 它不是權力真空下的產物。過去只以經濟發展的角度觀看大學的功利表現，批判文憑主義的肆虐，這個看法低估戰爭和其他非經濟性因素對台灣大學體系的牽制引導。

理念和現實的落差幾乎從大學設立之初就已經存在。在歐美國家如此，在東亞國家也是這樣，台灣並非異例。但理念和現實之間的緊張來源，在各個時代和各個地方都不一樣。在各有脈絡差異的情況下，研究者自然可做求同或求異的比較。但對本文而言，窮究緊張的來源，並以此回答高等教育內含的正義矛盾，才是意欲所在，比較研究非本文的興趣方向。對作者而言，正義和不正義的界線並非固定，它有脈絡性游移的空間。同時，以高等教育而言，正義與不正義的表現也有層次差別。各層次之間並非互相孤立，犬牙交錯的現象十分普遍。當然，這未必是高等教育獨有的現象，它可能出現在所有關於正義與不正義的具體討論上。誰的正義？誰的不正義？是具體看待這個問題的關鍵。不過，做此宣稱時，作者也同意正義和不正義的劃界有其規範性，它不是因人而異的界線。它是立足在社會契約論上形成的共同體認。強者和弱者都不能任意界定或改變正義的底線，聲稱自己是正義的使者或不正義的受害者。「正義」和「自由」、「人權」一樣，都有社會性，必須在社會的 (societal) 層次來區辨它的邊界。個人或團體（如宗教、政黨、行業、族群或階級等）的利益都不能成為正義的依據，正義也不應該受制於這些利益的存在，但正義必須以這些利益的公平實現做出發，形成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判斷。這個認定近似 John Rawls (1999) 對「正義即公平」的宣稱。站在社會契約論的立

27 「雙重內戰」意指 1945 年後國民黨在大陸和台灣遭遇的戰爭格局。除了必須經營大陸的戰場外，還必須面對接收台灣後的征服動作，後者因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而變得關鍵棘手。「雙重內戰」的開打，即指主權戰爭和社會戰爭的同步進行。在此過程中，權力的層級發展獲得高度強化，戰爭的體制化和職業化也成為常態樣貌。在台灣，這場由國家主導的雙重內戰前後進行了四十二年 (1949-1992)。有關「雙重內戰」的經驗討論，見黃金麟 (2009) 的相關分析。

場，正義的討論可以避開相對論的糾纏，也可以不理會後現代思潮對嚴肅性言談 (serious discourse) 的冷嘲熱諷。但社會契約論並不能阻止理念和現實的落差，契約論只能在觀念和想像的層次提出規範性的，以社會整體利益為考量的正義論斷。這是面對金錢與權力的時刻存在，人類社會必須謹守的防線。以高等教育而言，金錢和權力幾乎就是架構台灣高等教育的來源，若不願屈膝為僕，高等教育勢必要找到自己的戰鬥立足點，重新出發。

但是，到 1980 年前後，台灣的高等教育幾乎沒有立志要做自己的主人。物質條件的欠缺、師資的貧乏和學術成就的淺薄，都是限制。做為國家特許的事業，它不乏學生來源，而且因為大學數量有限，菁英教育的成分在激烈的入學競爭中表露無遺。不過，這些限制和利基對大學體系的影響，都比不上來自國家的箝制與誘導。動員戡亂體制的建立與軍事管制的實施，讓台灣長期處於壓抑、扭曲狀態。為了鞏固領導中心，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國民黨政權不惜以黨政軍特的力量，分化和壓制社會的反對聲音。同時，又以經濟發展需要的資源配置，強力支配社會經濟體系的建構。這裡頭自然也包括「軍公教福利國」的建立，與各種產業租稅減免措施的實施。在位階不對等，而大學的經費與人事皆受制於黨政官僚系統的情況下，特許事業的保護並不構成大學「出走」的條件。政治干預和軍事管制的動作，在大學的門牆內外一體適用。各種針對高等教育設置的法令，也讓大學的經營難有自主條件。我們不能否認，在此階段還是存在一些良知聲音，或秉持學術與思想自由，抵制與批評政治對教育干預的聲音。但整體而言，這些聲音是零星、薄弱的。包括胡適、傅斯年、徐復觀、殷海光和雷震等人，都曾是暗夜中的燈火，但大學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堅持和努力，就在制度上獲得學術與思想自由。以同情性的角度來理解，「無法成為自己的主人」並非大學的意願，時局的嚴苛與大學自身條件的薄弱，都阻礙這種意志的表現。

就現實來說，抑制大學理念的來源不只有政權生存和經濟生產的考慮。冷戰體系下的國與國關係，特別是不對等的地位與戰略需求，

也會在政策和實作的面向封殺大學尋求獨立自主的空間。使大學成爲國家的僕從，人力資源的培育中心，而不是培植心智與追求真理的獨立王國，在冷戰時期有極致表現。這種跨國的期待和算計，在美國的援華方案中不乏實例。這個事實說明，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交換，是社會不正義的重要來源。發生在國際 (inter-state) 層次的利益計算，不能被排除在不正義的考究範圍外。美國雖然沒有以介入內政的方式，夾殺台灣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與自主，但它顯然也沒有在扶持特定學門發展時，爲後者創造需要的自由空間。保持消極、互惠的姿態，不碰觸國民黨的政治禁忌，是中美科學學術合作期間美國對台灣高等教育的立場。維護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無疑才是美國的最高指導原則，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在這裡不具有重要性。美國的緘默無疑符合國民黨的利益，也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這種「作爲」與「不作爲」的區隔表現，自然也會影響到大學理念的落實。提出這個曾經存在的面向，不是要做責任歸咎，只是要讓不正義的生產層次獲得相對清楚交代。

除了國與國的關係，以及國家對大學的工具化使用會人爲化大學的發展外，大學體系內部的競爭與排序也會讓大學的理念難以完整表現。這是兩難的選擇。在大學不能遺世而獨立的情況下，世俗的期待和要求自然也會隨大學的營運，特別是大學需要資源與學生來支持其生存的現實，穿插進大學的經營中。在大學數量相對稀少，而且還是特許的階段，競爭資源和學生的壓力，相較於取消特許，大量增加大學數量的時期，其處境迥然不同。這兩個階段大體就是第一波和第二波大學擴張時期，台灣大學體系遭遇的處境。有意思的是，這兩個階段都有明顯的供需失衡問題。第一個階段是大學數量供不應求，大學成爲造就菁英之地，衍生的結果是升學主義肆虐社會；第二個階段是大學數量供過於求，大學成爲普及教育，文憑的價值快速貶值。但不論是處在前者或後者，大學都必須面對資源和學生素質與數量的競爭問題，只不過前者因爲特許數量的保護，情況不若後者惡劣。即便如此，國立大學之間、私立大學之間，和國立與私立大學之間也都還有

明顯的地位與資源競爭問題。有競爭就會有權宜與戰略，甚至會出現競爭手段凌駕大學教育目的的危險。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這個趨向愈來愈明顯。在生存第一的考量下，似是而非的市場化作為也競相浮上檯面，並被視為是生存的不二法門。相較於第一階段，市場邏輯以更肆無忌憚的姿態出現在大學數量急速擴充的第二階段。為了爭取來自國家和資本市場的資源，同時營造大學的競爭條件，1950年後的台灣大學體系幾乎都有媚俗傾向，而且，因為大學數量的急遽擴張，這個情況在1990年後愈趨惡化。上述的演變說明，大學理念的萎縮不盡然只發生在國際合謀與國家干預的層次，沒有理念與理想的排名和生存競爭，也會消磨大學試圖營造的獨立與自主。在批判國家干預學術自由，資本主義裂解大學的自主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大學的媚俗動作，如何在制度與行動的層次邊緣化大學的自主性，使大學的理念漸次失去顏色。當然，這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它幾乎是二十世紀的高等教育共有的宿命。

一個同樣令大學陷入理念和現實拉鋸的是，二十世紀的大學愈來愈和就業市場貼近。學門的異質性和多樣化已非二次大戰前的大學體系所可比擬。隨著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也亦步亦趨地出現質性改變。做為全球分工體系的一環，台灣沒有外於這個改變過程。一個明顯可見的變化是，追求高深學問，特別是與「求真」有關的學問，不再是高等教育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與國家治理和經濟生產有關的知識與人力培育。知識的市場價值和兌現作用，此刻已經比知識的真理成分更具有吸引力，連帶所及的是，大學紛紛設立各種實用性學系，以此聚集資源和吸引學生，增加大學的影響版圖。傳統的知識學門依舊存在，但對大學的學風影響已經因為各種技術性和實用性知識學門的出現，和其對既得利益的佔有，而大幅降低。大學不應該以培養「職業人」做為責任，折損大學的職志和使命，埋沒大學可能開出的心智超越效果，但這個忠告還是逆轉不了大學已經走上的世俗道路。當然，這個轉變有其買主和支撐力道，就業競爭力的表現就是證明。有需求就會有供給，道理十分簡單。不

過，對大學本身而言，這也是進退維谷的所在。當大學順應國家和市場的需要大量成立實用性學門時，自然也會面對從量變到質變的問題。除了資源的重分配外，如何在多元、異質的知識取向、既得利益和個人需求中取得公約數，定位大學的道德位置，本身就是挑戰。更有甚者，許多實用性知識的出現，其宗主就是市場，而不是人的心智培養或真理追求。這個落差有其難以跨越的鴻溝。現今的大學多少都面對這份尷尬，不再高言大學理念成為大學中人的新默契。這個潛規則的出現已經說明質變的發生。

從過程論角度來觀看，台灣的高等教育確實走到相對窄化的發展道路，工具性的性格與日俱增。從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的高等教育開始，不管是透過改制、復校或新設的方式，高等教育一直受到有形與無形的管制。片面性的引導發展和制度性的約束管制，讓高等教育無從發展自主意識。服務國家、服務經濟生產體系，成為高等教育的責任所在。大學因此獲得資源挹注，但付出的代價則是獨立自主空間的萎縮。在趨利避害的考慮下，自我節制成為高等教育面對威權體制的方式。這個論斷沒有否認，即便在高壓統治下，仍然有部分的異議聲音存在於大學，也有部分的大學校長試圖透過自身影響力保護校園中的自主權，但整體而言，自我節制仍然是主要特質。在黨禁、報禁、審查制度當道的年代，要大學獨力對抗執政者的恣意，實屬苛求。但大學角色和功能的窄化，確實也不符合社會的最大利益。畢竟，沒有另類的思考和選項，或者說，沒有超越現有秩序狀態的沈思，當下將變成永恆。閹割和犧牲大學的自主空間，其實就是在閹割和犧牲社會往前邁進的機會。在 1980 年以前，大學只是在部分的社會利益上，特別是在做為資本積累體制的那部分上，表現它的效能與責任。在超越政治和社會秩序的部分，大學尚未交出漂亮成績。

如果說大學理念——培養心智、開闊眼界、追求真理——的實現是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正義表現，現今的大學顯然正走上另外一條發展道路。以台灣的情況而言，營利性大學還未成為高等教育的支流，但非營利的成分也不保證大學就有獨立自主的意識與空間。從第一波

的大學擴張開始，世俗性的計算和價值賦予就主導著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在內戰和冷戰的大格局下，高等教育受到不同層次力量的合力穿透。在「威脅」和「利誘」的過程中，高等教育走過最初的三十年(1950-1980)，但真正讓大學理念沉潛消散的其實不是「威脅」的部分，而是「利誘」的無所不在。威脅可能刺激反抗和逃逸，但利誘卻可以不著痕跡地讓大學改頭換面，並賦予大學新的規範。1950年後，拜賜於戰爭的氛圍，高等教育獲得過去未有的發展條件，但戰爭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也牽引著大學的發展，與大學看待自身的方式。在評估這三十年的大學發展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戰爭對台灣高等教育的提攜與限制作用。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了解，不正義的起源其實隱含在不同的層次與範疇。殘缺的正義不是由單一因素所造成。在罪責國家和資本主義窒息、消解大學的理想和理念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大學和大學中的成員也正在做共謀的動作。1990年後，這種合謀的情況更形嚴重。

六、結論

為了提升台灣高等教育的競爭力，同時區隔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的類屬發展，教育部在2006年和2005年分別推出了「發展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和「教學卓越計畫」的專案規畫，分別以五年500億和每年50億的經費，誘導大學走出國際競爭力，或強化大學的教學能力表現。暫不論其內容和成效如何，特殊經費的編列和每年的獎補助款一樣，都已經對大學造成誘導作用。當獎補助款被視為是教育部對大學的認可，而獎助款項又是以辦學績效來評比時，就算分配的經費不多，得到獎助總是意味得到辦學成效確認。在大學數量供過於求的階段，沒有大學敢於冒著「辦學績效不佳」的風評，挑戰教育部的評比權威和折損自己的招生空間。同樣的效果也顯現在特殊經費的編列上。在「邁向頂尖」、「追求卓越」的口號下，教育部以設定好的研究和教學標準要求於大學，而取得經費的大學也以此為

榮，視得獎為「頂尖」、「卓越」的標章，義無反顧地繼續按照部訂標準賣力前進。這幾乎是一個完美的合奏。教育部繼續取得高等教育的主導權，引領大學進行分類發展，大學則獲得可欲的榮譽。表面上看來，只有那些沒有拿到補助款或卓越獎項的大學才是輸家，但真正的最大輸家其實是整個社會。因為當大學將權力與金錢視為自己的服膺對象時，大學也繼續失去它做為自己主人的機會。連帶損失的是，社會應該從大學獲得的心智提升與視野拓展也無從實現。這個評斷是就大學與社會的整體發展而言，不涉及個別研究計畫的成果論斷。

當然，以趨勢發展的視角來說，這種利誘大學，使大學服膺於國家治理的需要和經濟生產的脈動，並非新鮮之舉。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當道的歲月，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前途往往成為大學不能拋擲的責任。抗戰時期的中國大學清楚表現這種「扛大任」的道德作為。國族的生存危機和不正義的侵略戰爭，構成大學服膺國家領導的條件。然而，動員戡亂時期的國家並沒有這類正當性。政權的生存和一黨專政的體制毋寧才是內戰無限延長的原因。在沒有民族情操可資動員的情況下，高壓統治和利益誘導成為國民黨交叉使用的治理手法。做為征服社會的手段，它們也沒有缺席於大學的建置上。從 1950 年代開始，美援和美國的基金會就已經在發揮金錢的魅力，使大學的體系和學術研究充滿美國身影。1978 年台美外交關係的終止，和 1980 年代台美在經濟和貿易領域的摩擦，都構成台灣走出美國支配的條件。反省美國對台灣的「殖民」影響，也變成 1980 年代的重要學術思潮。但沒有改變的事實是，高等教育的經營必須要有足夠的物質條件，否則難以為繼。在一手限制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數與學費收入，一手以獎補助款的方式填補大學的財務缺口時，大學也失去經濟自立的基礎。仰仗教育部的鼻息變成台灣高等教育的歷史特質。五年 500 億和每年 50 億的「研究卓越」與「教學卓越」計畫，不會改變大學的臣屬地位，也不會為大學創造新的獨立自主基礎，反而強化既有的不公與依賴。相信金錢能創造奇蹟的行政官員與大學領導階層，必須想想台灣的大學與社會終將何往？

參考文獻

- 中央社，1961，〈福特基金會撥款 贈我中研院 協助研究中國問題〉。《聯合報》，第2版，12月26日。
- ，1965，〈美福特基金會 資助匪情研究〉。《聯合報》，第2版，12月26日。
- ，1967，〈聯合國撥款百萬美元 助我發展職業訓練 中研院獲福特基金會贈款〉。《聯合報》，第2版，1月20日。
- 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代表，1954，〈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頁805-809，收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第三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文馨瑩，1990，《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台北：自立晚報社。
- 王世杰，1980，〈台灣的科學生根問題〉。頁443-449，收入國立武漢大學旅台校友會，《王世杰先生論著選集》。新店：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 71-116。
- 吳大猷，1972，〈中美科學技術合作之回顧與前瞻〉。《東方雜誌》5(12): 7-12。
- 吳翎君，2009，〈戰後台灣におけるロックフェラー財団の援助事業〉。頁119-142，收入貴志俊彦、土屋由香主編，《文化の冷戦時代》。東京：國際書院。
- 李濟，1959，〈文化沙漠〉。《自由中國》12(10): 302-303。
- 官有垣，2004，《半世紀耕耘：美國亞洲基金會與台灣社會發展》。台北：財團法人台灣亞洲基金會。
- 美國加州史丹福研究所著、中央建教合作委員會譯，1962，《教育與發展：中華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教育計畫之任務》。台北：教育部。
- 胡適，2001，〈中國的私立大學〉。頁76-79，收入楊東平編，《大學精神：五四前後知識分子論大學精神之經典文獻》。台北：立緒。
- 若林正文著、洪金珠、許佩賢譯，2009，《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新自然主義。
- 張朋園，1984，〈從台灣看中美近三十年之學術交流〉。《漢學研究》2(1): 23-55。
- 教育部編，2000，《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台北：教育部。

- 郭沫若，1954，〈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頁 797-799，收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第三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湯志傑，2008，〈本土社會學傳統的建構與重構〉。頁 553-630，收入謝國雄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
- 黃武雄，1997，《台灣教育的重建》。台北：遠流。
-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台北：聯經。
- ，2014，〈以戰為治的藝術：抗美援朝〉。頁 227-291，收入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
- 楊東平編，2001，《大學精神：五四前後知識分子論大學精神之經典文獻》。台北：立緒。
- 楊翠華，1999，〈王世杰與中美科學學術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歐美研究》29(2): 41-103。
- 經濟日報，1974，〈美國大通銀行決擴大在華投資 將加強融資業務，提供我國各項建設中長期貸款 洛克菲勒昨抵台曾與我方商談農業研究合作計畫〉。《經濟日報》，第 2 版，5 月 20 日。
- 趙既昌，1985，《美援的運用》。台北：聯經。
- 趙綺娜，2001，〈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31(1): 79-127。
- 聯合報，1995，〈技職？升學？僵化的分流教育 封閉了交流管道〉。《聯合報》，第 17 版，7 月 11 日。
- Amsden, Alice.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78-106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k, Derek. 2003.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Jaspers, Karl. 1965.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London: Peter Owen Limited.
- Kirp, David L. 2003. *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s: 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nn, Michael. 1988. *State, War and Capitalis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 Marx, Karl. *Early Writing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 McClelland, J. S. 著、彭淮棟譯，2000，《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商周出版社。(McClelland, J. S. 1996. *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 Newman, John Henry 著、高師寧、何克勇、何可人、何光滬譯，2003，《大學的理念》。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Newman, John Henry. c1999.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nis, Ziya. 1991. "Review: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 24(1): 109-126.
-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uch, Richard S. 2001. *Higher ED, INC.: The Rise of the For-Profit Univers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u, Nai-teh.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